

中国前近代史理论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ISBN 7-216-02007-3

I. 中...

II. 武...

III. 中国—古代史—清前期—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K249.53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武汉市汉桥印刷厂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27.375

字数:681 千字

插页:5

版次:1997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140

定价:34.00 元

书号:ISBN 7-216-02007-3/K·198

前言

1996年4月28日至5月3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和历史系主办,日本中国史研究会、中国唐史学会协办,在武汉大学召开了“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本论文集即是这次会议的成果。

中国前近代史,即近代以前的中国历史,亦即国内通称的中国古代史。由于“古代史”易与“ancient history”的汉译相混,而后者在国际学界通常特指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古代,本与“medieval history”(中世纪史)、“modern history”(近代史)相对,从而带有特定的社会形态含义。为避免在国际交流中滋生误解,故在会议名称中以“前近代史”代替国内通称的“古代史”。

由已故唐长孺教授创办并长期担任所长的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是中国古代史(即中国前近代史)学科的首批博士点和全国重点学科点。本所向来注重历史理论的探讨和国际学术交流,早在1987年,就曾与日本著名史家谷川道雄教授为首的中国中世史研

究会,进行过国际合作研究,以共同探讨中国中古历史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有关论文在日本结集出版,谷川先生至今仍在我校兼执教席。在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方面,本所与海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交流关系。近年来,本所又同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中村哲先生,以及以“中村理论框架”为基础的中国史研究会,开始进行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特别是在中国前近代史理论方面,双方表现出共同的研究兴趣,都觉得有必要召开一次学术会议,以专题探讨有关理论问题,交换彼此研究的心得,商讨未来研究的方向和合作的途径。这就构成了召开本次“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缘起。

1994年11月,经武汉大学社科处、外事处等主管部门批准,本所暨历史系开始正式筹办此会,并成立了以所长朱雷教授、系主任胡德坤教授为首的筹备委员会。中村哲教授和中国史研究会不仅积极参与了会议的筹办,而且慨然资助了会议所需经费的大部。中国唐史学会亦多方促成此会召开。1995年秋,国家教委正式下达了同意召开此会的批复文件,并拨款资助。正是承蒙上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本次会议得以如期圆满举行(有关会议情况详见本论文集所载“会议综述”),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为了使会议成果尽快面世并存诸久远,日本中国史研究会又多方筹措出版资助,以促成会议论文集及时出版。当今学术著作出版之难,世人皆知,素来订数难上的学术论文集,出版更是难上加难。幸蒙湖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王建辉编审垂爱,欣然接受了本论文集的出版,并亲任责编,作了大量的工作。值本论文集编定付梓之际,作为会议主办者的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暨历史系,不禁对以上各个方面的鼎力相助,满怀崇敬之意和感谢之情。

会议共收到中外学者提交的专题论文凡49篇,除少数几篇外有45篇收入论文集中。这些论文从各个不同侧面探讨了中国前近代历史的特征、规律等重大理论问题,本论文集就其基本内容分别

归入以下六个部分：“马克思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与中国前近代史理论”，“中国前近代历史发展的特征和趋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问题”，“小生产经营方式问题”，“商品货币经济问题”，其余难以归属者作为一类。后附“会议综述”，以简介会议情况及论文的主要内容。

本书由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主持编辑，并成立了由牟发松、冻国栋、何德章、陈伟、张建民、夏日新等六人组成的编辑小组。其具体分工如下：牟发松主要负责第一、第二两部分论文的编辑（共11篇），以及论文集“前言”及“会议综述”的撰写；陈伟负责编辑有关六朝以前及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共6篇）；何德章负责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文（共7篇）；冻国栋负责有关唐代的论文（共5篇）；张建民负责有关唐以后时期的论文（共7篇）；夏日新除两篇社会史方面的论文外，还负责日本学者所提交论文汉译本的校改和编辑（共9篇）。

论文集编辑小组的工作，除商定论文分组、编定目录以外，主要限于核对部分原始资料和引文，并力求统一注释体例。有时也对与论文主旨无关的内容稍作删节，但不作有关论文实际内容的更动。因此所收论文，不代表论文编辑者的意见，文责一律由作者自负。本集中所收海外学者论文，某些提法和用语读者或许感到陌生，甚或隔膜难解，这当是观察问题的不同角度和不同理论框架使然，这也说明需要进一步加强交流和增进理解。但望这次研讨会能对促进国际学术交流有所助益。

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

目 录

中国前近代史理论的重构

- 序 说 (日)中村哲 著 牟发松 译(1)
- 论封建主义 马克尧(35)
- 哲学、思想与史学的关系 胡如雷(54)
- 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一文的研究 朱家桢(60)
- 《资本论》与“前资本主义论” 牟发松(78)

从中西对比看中国汉宋之间封建经济结构的

- 若干重要特点 张泽咸(101)
- 地租与封建制——“初税亩”标志封建制论
商榷 卢开万(124)
- 秦汉隋唐间的历史大势 胡戟(132)
- 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而提出的一个

方法……………(韩)朴汉济(155)
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内徙及其社会形态
变化之研究……………周伟洲(178)

历史发展的诸种类型与中国专制国家

……………(日)足立启二 著 雷绍锋 译(197)
关于意识形态阶级——中国专制国家的统治阶级
……………(日)渡边信一郎 著 牟发松 译(218)
中国史上的两个时代:春秋战国与秦汉以后
——专制国家论序说……………(日)吉田滋一 著(240)
民主制、宗法制和先秦贵族……………郑敬高(276)
汉代政治体制散论……………孙继民(288)
魏晋南北朝的皇权与门阀……………杨德炳(303)
十六国时期的军镇制度……………高 敏(313)
隋代君权与相权……………(香港)刘健明(332)
唐代江南文士群体初探(下)——兼评文士对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的依附与叛逆……………郑学檬(351)

中国史上的国家土地所有与农民土地所有

……………(日)岛居一康 著 柳春新 译(369)
中国古代租佃关系与租佃契约浅论……………陈国灿(391)
秦汉六朝时期自耕小农与农奴、奴隶之间
几种过渡性的农业劳动者……………黄惠贤(403)
《奏谏书》所见汉初“自占书名数”令……………陈 伟(429)
北魏城人与农耕……………何德章(435)
唐宋时代的小生产方式及其发展阶段
……………(日)大泽正昭 著 牟发松 译(443)
《唐律疏议》中有关“部曲”法律条文

的现实意义·····	朱 雷(465)
唐代的小农经济与经营方式管见·····	冻国栋(477)
庸值的构成及其实质和特点·····	李春润(501)
中国近世村落社会结构的构成和特点·····	徐扬杰(517)
明代里老人制的再认识——围绕村落自治论、地主	
权力论的周边·····	(日)伊藤正彦 著 夏日新 译(535)
论康雍乾时期的蠲赋与减租·····	张建民(560)

中国货币经济论序说

·····	(日)宫泽知之 著 夏日新 译(583)
再论中国历史上的市场经济问题·····	尹 进(605)
商品货币关系发展水平与生产结构的关系	
——以公元1世纪前后为例·····	赵德馨(621)
中国前近代社会中原始工业化进程的反复启动及其一再夭折	
——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性缺陷·····	葛金芳(652)
明清时期“农民非农民化”现象的发展与	
农业结构的异变·····	吴量恺(675)
明清时期土地制度、宗族与商业化	
——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叶显恩(702)
从明代城市功能的转变看中国文化的	
转型·····	谢贵安(726)
清代银钱比价的波动及其对策·····	陈 锋(744)
中村哲《奴隶制与农奴制的理论》评介·····	黄孝春(764)
“隆中对”与“吴门对”的比较能说明什么?	
——试论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及其影响·····	王延武(769)
永嘉乱后汉人对河西的迁移及其文化	
意义·····	葛剑雄(783)

腊日的习俗.....	夏日新(796)
《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秦两汉若干地理 补正.....	徐少华(810)
唐《苗弘本墓志》反映出的几个问题.....	鲁才全(827)
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牟发松(841)

中国前近代史理论的重构

——序 说

● (日)中村哲 著
牟发松 译

前 言

20 世纪末的今天,世界处于激烈的变化之中。中国当然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是世界大变动的核心之一。特别是 1978 年底转向开放政策以来,变化之大,以至于 1992 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四大,将中国的体制规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3 年 3 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又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明文载入修改后的宪法中。这是放弃中央指令经济和实现市场经济化的正式宣言。中国在今后,势必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而在这一过程中,也会有很多的困难。那么,中国的国家体制和政治结构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这种市场经济又将循着何种轨道运行呢?

我国要根据现在的变化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来领会现在变化的性质和它对我们的意义。所谓历史,通常是相对于现代化社会中生活的人类而言的历史,是从与现代的联系中来理解的历史。只是历史学既然作为一门科学,不会在现实的变迁中埋没,我们必须根据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考虑与现代的关

联,来把握历史,并客观地确定现代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位置。特别是在中国史研究方面,在考虑与现代的关联中来把握历史这一点上,过去往往不是科学的,它被混同于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出发加以把握。这就导致简单地依归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削弱历史学的独立性。对此加以反思是必要的。

从历史上看,现代世界的巨大变动,意味着本世纪 30 年代开始形成、战后得到确立的世界体制——经济上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制、政治上以美苏两极对立为中心的冷战体制,业已开始解体。有如 19 世纪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从 19 世纪末走向解体,战后确立的以美国为中心的 20 世纪资本主义体制也开始解体,而进入向 21 世纪新的世界体制过渡和转轨的时期。现代中国即是这种变动的一环。

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形成于 19 世纪 20—30 年代。支撑着这个理论框架的主体意识是: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在两次世界大战和 1929 年所谓大恐慌的世界性危机之中,特别是以日本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所造成的危机状况?如何展望未来?战后以至于今,中国史研究的这种理论框架,随着研究的进展而内容趋于丰富,理论水平也得到提高,但另一方面,由于现实的变化和研究的进步,其有效性却渐次渐低。

目前,20 世纪的资本主义正在向 21 世纪的资本主义过渡,中国的体制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当此之际,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把对这样一种现实的认识纳入其中,应当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共同研究也正是为这一目标而作的一部分努力。

一、中国史的四种认识方法

到目前为止,对中国史的看法(限于现代社会科学的看法),从大的方面可分为四种。其中每一种都具有不完全性,在现在这样一

个历史阶段,或失去、或降低了其有效性。

一、亚洲停滞论——西欧中心史观

这样一种看法,18世纪后半叶以后开始形成于西欧,19世纪臻于极盛,进入20世纪后虽多少有些变形,其实在理论上是更加精密化了,直到现在,仍是一种具有影响的想法【1】。典型的有黑格尔、马克斯·韦伯、马克思、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者与之也是相通的【2】。在日本,大冢史学堪称典型,讲座派、工农派之类的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在内。中国史研究者中有这种看法的也很多。

二、西欧中心史观的变型——将日本纳入西欧的看法

这样一种看法战前已经存在,作为典型形成于战后,梅棹忠夫(《文明的生态史观》)可作为代表。其中也包括E·莱夏瓦(《日本近代的新看法》)等所谓现代的近代化论者【3】。

这样一种西欧中心史观及其变型,具有一定的历史根据,必须予以重视。从意识形态和从政治方面对这种看法进行批判,或者从历史学的观点出发对之进行批判,并从体系上提出取而代之的看法的研究,迄今还没有见到。这种看法还没有过时【4】。

再者,基于亚洲停滞论立场最有体系最具有总括性的理论著作当推K·威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1957)。该书副标题为“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是对极权力量和亚洲专制国家的分析,从根本上说是站在批判(前)苏联共产党的中央集权社会主义体制的立场上的【5】。

三、世界史的单线发展论

中国在前近代也基本上经历了与欧洲相同的历史发展,也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等形态的相次推移,这是基于斯大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之上的单线历史发展论(单线的,而且是直线的进步史观)。

这种看法,在日本依据马克思主义进行的中国史研究中,占压倒多数,其开端是西岛定生、堀敏一两氏在1950年度历史学研究

会上的大会报告【6】；小山正明、重田德两氏探求中国的封建制在明末清初的成立，认为宋代到明代为中国由古代向中世的过渡期【7】，是对上述看法的承继。

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是肤浅的，存在理论、方法方面的问题。为了以西欧为基准来测定与西欧有异的中国史，对于中国的奴隶制、封建制有异于西欧之处就不得这样处理——认为在形态上和时期上要相对落后一些，其结果，就不能摆脱落后于西欧而表现出停滞性看法。

另外，这种思想方法，是以无条件地肯定 1949 年的中国革命，认为它具有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毛泽东理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为前提的。现在，中国正在发生变化，这种思想方法的影响力正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国革命自身不得不重新反思的状况而急速地减弱。

四、文化史的发展史观

可以说这是所谓京都学派对中国史的看法，它以内藤湖南为其首倡【8】，宫崎市定则为其集大成者【9】。这种观点将文化理解为政治、经济、思想、学术、技术的总和，而将历史理解为文化的发展。从而重视作为发展条件的交通和由交通发展导致的文化的传播。提倡“世界人的世界史”、“客观的世界史”【10】，根据欧洲、西亚、东亚三大历史地域的交流来构想世界史的发展。

这样一种看法和构想值得继承的地方诚然很多，但为了使出现在欧洲历史上的古代、中世、近世（即近代）的历史三阶段的区分也适用于东亚，便主要从与欧洲（实际上是西欧）史的共同面来把握西亚、东亚的历史，而轻视各地域的特殊性，又将产业革命以后的欧洲近代（宫崎所谓最近世）作为历史的最高发展阶段，如此等等。这些地方，又与欧洲中心史观具有共同性。还有试图立足于文化的整体性来把握历史，这是很不错的，但因为想要一举进行，所以理论的构建便显得非常不足，这也是一个缺陷。

五、共同体的持续,再生论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史和西欧史不同,共同体关系通常存在于社会的深层,并规定着社会的面貌;而这也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条件。在中国史研究方面以谷川道雄为代表【11】,实则毛泽东,还有马克思,也有与之相同的看法。在强调共同体的持续存在和相对于西欧的异质性上,与亚洲停滞论、西欧中心史观是相同的,但其评论却适成相反。这种观点对共同体关系的理解是将其放大到相当程度(延伸到阶级关系和国家),具有理念的色彩,而对共同体的具体状况则未言其详。当中国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真相已显露清楚,中国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这种观点我想已丧失其意义。

建构一种取代以上四种或者说五种(将日本加入西欧的观点也单独算为一种)思想方法并基于现代历史状况的新的思想方法,确实是必须的,但是现在,要系统化地提出这样一种思想方法还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试图仓卒而勉强地进行这种理论工作。不如说,现在有必要通过众多研究者之间的相互协作和相互批评,创造出建构一种新的历史理论所必需的各种前提条件。因此,下面想指出在建构中国史新的理论框架时所必须考虑的几个问题,进而提出几个有关中国前近代史理论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至于这里没有提到的问题中当然也有重要的问题,则是不待说的。

二、关于中国史方面应予考虑的若干问题

一、从历史的角度来把握现代世界和其中的中国的状况、变化,结合这一点研究中国史

现在世界急剧变化的原动力之一,是东亚资本主义的兴盛。中国作出转向开放政策的决定,主要原因之一也是日本、亚洲新兴工业区域尤其是东南亚国家联盟诸国资本主义经济的急速发展,在当前,这又成为中国经济的市场经济化、和世界市场接轨进展比较

顺利的主要原因。而世界体制向 21 世纪资本主义转轨的一个主要侧面,即是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也是其中的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应有的方向。21 世纪的中国将形成一个什么样的自身形象?中国的历史又将给它提供一种什么样的规定性【12】?

二、能够表明东亚特别是东北亚(中国、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北朝鲜)历史的共同性和互补性的理论框架

历来的研究,对近现代东北亚的思考模式为两极分化论(日本的帝国主义化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朝鲜的殖民地化,日本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的斗争)和近代化论(日本近代化成功,中国、朝鲜则失败),这样体现出一种很强的倾向性,即强调中国、韩国及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对立面及异质性、差异性。然而,从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看来,我们必须建构一幅既包含这样一些对立面及差异性,同时又将东北亚的共同性和相互补足关系考虑在内的历史图像。而这对于克服见诸前近代史中的中华帝国的东亚观(中国中心史观)也是必要的。

三、能够评价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

前节所述在理解中国史时要克服停滞论和西欧中心史观,这是不言而喻的,为了把握转向开放政策以来现代中国的变化的历史特性,这也是必要的。例如,同东欧和以俄罗斯为首的原苏联诸国现在的政治、经济的混乱状况相比较,中国的体制转变却相对平稳,还有人民公社的很快解体,小经营农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等等,这些现象的历史条件究竟是什么?是应予考虑的问题。前近代时期农业领域的小经营生产方式相对而言(世界范围内)的高度发达,16 世纪后半叶以后农民中单纯小商品生产者的成长,以及官僚制的历史性的发展等,可视为上面所说的历史条件。作为乡镇企业发展条件的人民公社的经验,以及 16 世纪后半叶以来以镇为中心的农村小市场圈,福武直氏所谓乡镇共同体(华北地区尚未发展成镇的市集共同体【13】)的形成,也应予考虑。

四、作为中国史独特性的专制国家之长期存在，特别是从古代到近代连续延存乃为世界所独有

古代帝国除中国以外，还有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波斯、印度、拜占廷（或许还要加上美洲大陆的阿兹特克和印加等），但无不在前近代时就已灭亡。这些帝国灭亡后，它们所在诸地域的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从延续到近代而言，俄罗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是较晚近的，但两帝国充其量不过起于中世以后而已。讲到专制帝国的历史，多认为是停滞的，但帝国的历史既有发展的情形，也有停滞或循环的情形，是多种多样的。将专制帝国和停滞性联系在一起，是近代欧洲的偏见。中国的历史是专制帝国的历史，但从生产力、社会结构以及国家机构等等方面看来，均取得了相当显著的历史发展，这一点也是中国史的特征之一。

五、作为世界史多线发展的主轴之一的中国史

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根据西欧中心史观所把握的世界史，多是从亚洲和欧洲（实际上是西欧）相对照中来看问题的，如认为共同体有亚细亚的、古典的和日耳曼的三种形态；国家和阶级的形成有亚细亚的道路和欧罗巴的道路；资本主义在欧洲是内部自然生长而形成的，在亚洲则是受外力影响而形成的；在欧洲已形成市民社会，而在亚洲则没有形成。然而，拿国家形成来说，随着中国史研究的进展，中国的国家和阶级的形成的本来面目已被澄清，与那种西欧中心主义的现成理论全然不符。以往人们认为，亚洲因为国家的形成是在亚细亚共同体或者农耕共同体未曾解体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专制国家得以成立。但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是：中国的专制国家是在氏族共同体或者说农耕共同体相对（较之欧洲更甚）彻底地解体的情况下成立的【14】。

所谓亚洲原本是欧洲人的讲法，从世界角度看并不是一个很得当的历史、地理概念。包括国家和阶级形成在内的新的历史理论，必须基于对世界各地域、各民族的历史研究之上，而不是基于

亚洲和欧洲的区别来进行构筑。从中国史是按照专制国家历史的规律演进这一点来看,加之相关研究的实证水平很高,这使得中国史在多线的世界史的理论的构成上,将成为核心之一,是毫无问题的。

六、中国史空间范围扩大的倾向

读中国史可以发现中国地域范围是随着历史发展而扩大的,其政治、经济和文化重心发生过地域性变动。中国自古以来,包括驱逐和同化异民族在内的开发活动在区域范围上不断移动,其经济区域则直到近代都在不断地扩大。这种情形,如春秋战国时期扩张到黄河中、下游流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发展到江南,宋代、元代到江西、福建,明代到湖广,清代到四川周边地带、广东,清末、民国时期到台湾、满洲地区等。中国社会每当一个大的变动时期,或因自发的移民及流民,或由于国家的强制性徙民政策,总有大量的人口从旧的区域移动到新开发地区。

现在,人口移动进一步向内蒙古、新疆、云南和西藏等地推进。海外华侨是此潮流及于国外的产物。不过,一般说来,前近代时国境并不明确,中华帝国的疆域不存在国境问题。我们日本人习惯上把中国看作一个文明古国,实际上中国就地域论,较之日本,还不如说是一个新形成的社会为好。

七、中国农民的非定居性格

本条是与第六条相关联的。我认为:农民自古就被纳入到以中国的统一专制帝国的长期延存和以国家财政为基础的全国性商品流通之中,村落共同体之类闭锁的、自我循环的社会集团没有充分形成。这些条件造成了中国农民的非定居性格。此外,宋代的主客户制与明代的里长户、甲首户、畸零户制度(里甲制)一类乡村统治组织的建立,也是中国农民非定居性的原因之一。不过,在日本,一直到中世,农民的流动性、非定居性似乎也是相当突出的。故这一点既是中国史的特征,又是前近代农业、农村所共有的因素在起作用。